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博雅
21世纪政治学规划教材

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ies and Methods

杨光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
雅

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ories and Methods

杨光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序 言

冷战时期兴起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力军便是阿尔蒙德所领军的美 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的（严格地说就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宰制性主题就是“现代化”（20 世纪 50—70 年代）和“民主化”（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头 10 年）；与研究主题相适应，研究范式也从“结构功能主义”适时地转向“转型学”。无论是研究主题还是研究范式，其核心都是如何使其他国家演变成美国式的现代化或民主化国家。结局如何呢？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研究并没有使其他国家因实现“现代化”而变得更好，反而是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朽；今天，“民主化”研究也没有使绝大多数转型国家“抵达丹麦”，反而是“无效的民主”导致的治理失败；更有甚者，“大中东民主计划”酿成大中东的大乱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中东秩序彻底崩溃，无序中东“贡献”的是恐怖主义和乱民潮，西方近代民主发源地巴黎变成了血腥屠场。

社会科学必须直面当下重大政治社会问题。残酷的世界政治现实迫使我们反思既有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这里有一个目的论性质的前提性问题，即研究比较政治学是为了什么。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比较研究看起来在研究他国，但落脚点则是本国，这就是我所说的“比较研究的本国中心主义”。如果说国外的比较政治研究是为了改造他国并使其他国家更像自己，而处于国家建设中的中国则是为了建设自己，研究他国是为了建设自己。这种目的论上的“本国中心主义”决定了，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着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下，去比较性地解释和理解中国实践。

目 录

导 论 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	1
---------------------------	---

上编 比较国家建设：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 结构论：“现代国家”的三维结构	37
第一节 现代国家的权力与权利之维	38
第二节 现代国家的第三维度：资本权力	51
第二章 时序论：政治发展的次序	65
第一节 早发国家的政治发展次序	65
第二节 中国政治发展次序	79
第三章 道路论：通向现代国家之路	95
第一节 英国—美国：商人阶层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	97
第二节 法国—德国—日本：官僚体系主导下的现代国家之路	104
第三节 俄国—中国：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国家之路	110
第四节 国家建设经验之理论意义	120
第四章 方法论：比较历史分析	127
第一节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127
第二节 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论化	139

中编 比较政治制度：理论与方法

第五章 政体理论重述	159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	160
第二节 政体理论的新发展：从谁统治走向如何统治	171

第三节	政体理论蜕变的意义	181
第六章	民主集中制政体	186
第一节	作为中国模式的民主集中制	188
第二节	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	202
第七章	方法论：比较制度分析	222
第一节	政治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与观念	222
第二节	制度范式	229
第三节	历史制度主义的“否决点”	250

下编 比较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

第八章	作为行动者的国家	261
第一节	国家目的论	261
第二节	国家形态论	270
第九章	阶级与利益集团	288
第一节	阶级与阶级分析	289
第二节	利益集团	301
第十章	国家社会关系论	315
第一节	统合主义	315
第二节	社会运动理论	328

导 论

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

一、导言：作为社会科学知识增长点的比较政治研究

本书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简单概括是：比较政治学就是基于“本国中心主义”的国别经验“比较”而得出一般性概念和理论。这就是说，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虽然是他国，但出发点是本国，即为了本国的需要；为此，本国政治经验就应该优先成为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这一点必须得到明确，否则就变成了为研究而研究，变成了研究方法精巧细致却最终没有任何智识贡献的游戏。如果了解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对此就不会有任何疑问。国内比较政治学起步晚，且起始于美国政治学行为主义方法论泛滥之际，必然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美国式行为主义比较政治学方法论，而不去反思美国比较政治学方法论的历史演变，以及历史背景对研究范式、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的影响。

没有“比较”就没有比较政治学，因此比较政治学本身就具有“比较方法”的蕴含，或者说比较政治学就是以“比较方法”为学科禀赋，为其根本研究方法。形形色色的研究方法如个案研究、统计分析，最终都是为了“比较”，其核心方法是“比较”。

国别研究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但是如果仅有国别研究的经验基础而无通过“国家比较”而形成的概念、理论和话语，则是有“器”而无“道”，器物层面的研究充其量可以用来制定双边政策而很难拥有国际话语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具备全球性影响力的大国才最需要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的落后带来的必然是相关学科的滞后和发展瓶颈，因为比较政治学是相关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交集点和知识增长点。西方人把政治学细分为政治学理论（含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本国政治、国际问题、政策科学（公共管理）等分支学科。就分支学科的关系而言：

(1) 本国政治和政策科学实际上都是比较政治内含的学科,本国政治经验是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基础,政策科学比如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比较公共政策研究。

(2) 就比较政治与国际问题的关系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不存在什么国际关系学或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问题都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世界政治与比较政治的区分只不过是表述的不同而已。国际关系领域热衷讨论的中国崛起是鲜活的世界性话题,但中国是怎么崛起的?本源自然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动力机制所致,因此这只不过是一个国际性话题而已,一个崛起后的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办的课题。

(3) 就比较政治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而言,我们知道政治学的一般性理论比如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议会制、民主与专制乃至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这样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范式,都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产物;同样,更多的比较经验研究也会纠偏或者丰富政治学理论和命题,比如苏联(俄)、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建国历程是不同于早发国家的政党主导型,这显然不是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能够解释的;再如“两党制比多党制稳定”这样的命题也并不确切,不少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比两党制更好,等等。

(4) 更为国内学术界所忽视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乃至政治哲学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先验”的吗?即使是先验的,也是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从托克维尔到马克思,以及近代的白芝浩与威尔逊,这些“政治思想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向来都是比较政治学者”^①,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他们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因此我们切不可把这些人的思想视为哲学中的“先验”,而应视为历史语境中的“先验”即先前的经验。这就需要对“先前经验”(相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当下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解与研究,从而才有能力做到甄别、放弃与吸纳,否则我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乃至政治哲学研究就永远停留在翻译、引介和诠释水平,诠释完一线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等,再诠释二线思想家如美国开国之父们,然后就是形形色色的莫名其妙的三线乃至不上线的思想家。这种仅仅基于文本的思想解读陷入了社会科学的一元化思维,即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社会科学至少是二维的,

^① 威亚尔达等著:《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台北韦伯文化公司2005年版,第4页。

即理论与现实或者理论与历史。这里的现实或历史就是比较政治的经验研究。

(5) 另一方面,研究者如果熟悉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知道,很多古典思想需要得到反思甚至重构。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既完全不同于政治化的古典城邦,也不同于近代洛克笔下的二元化结构即政治—社会,今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三元化结构。这就是说,“利维坦”不仅仅是政治的国家,还有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考虑到这样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无论是古典思想本身,还是基于文本解读而发展出来的新古典思想如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或者新共和主义等思潮,我们都需要更谨慎对待,因为很多关于政治、关于国家、关于人性的古典命题都没有考虑到资本权力这个“利维坦”或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化社会”。在我看来,没有研究方法上的“新路径”,国内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引介与诠释阶段。要真正复兴国内的政治学理论,应该回到源头,即比较政治研究与政治哲学不分家的传统,这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和好的路径。这也是美国政治学者戴维·阿普特(David Apter)所呼吁的。

简单地回顾了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比较政治学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发展中国的比较政治学?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不但是学习,而且是直接拿来,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就是“拿来主义”。在赵鼎新教授看来,中国社会科学量化方法发展过快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留学归国学者不加甄别的拿来主义。^① 了解、学习、借鉴都是必要的,但比较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本国中心主义”性质决定了,他国的比较政治学只能用于学习和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至少新一代学者不能再停留在照抄照搬层次,从研究方法到研究主题(即研究议程),都不能跟着美国比较政治学跑,不能随便把美国政治学中的一个“人物”当做学科发展的“地标”。对此,那些最了解美国社会科学性质的学者是有反思意识的,比如不满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代化—民主化研究范式和主题,徐湘林教授建构了比较政治学的“国家治理”研究范式。^② 同时,我也认为,看似繁荣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其实已经是“丰裕中的贫困”,近20年来其科学研

^① 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载《文汇报》2011年7月4日。

^② 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载《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究很发达,学术杂志很繁荣,但启人心智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少。^①

看来,建构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必要且恰逢其时。下面我们首先评论基本能够整体上反映研究状况的国外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在了解、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政治,试图建构出一套自己的比较政治学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

二、国外比较政治学教科书体系：从西方发展主义到非西方发展理论

专业人士都知道,所谓国外比较政治学主要是“美国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林林总总,要进行全面而周到的评介很困难,中译本也不少,而且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据此而做出总体性评价。扼要地说,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经历了从西方发展主义到非西方发展理论的演变,而且从研究方法到研究主题大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首先需要排除的是,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而属于一般性的政治理论流派介绍。

1. 西方发展主义系列。对美国比较政治学影响最大,甚至至今依然有一定影响的教科书无疑是阿尔蒙德领衔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美国1974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其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其实,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研究不仅限于这本书。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在三个时代有三个连续性的升级版。

第一版是阿尔蒙德领导的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下的比较政治委员会编写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59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它是美国比较政治委员会集体的“理性财富”。不得不让人感怀的是,在极具个人主义文化的美国,七八个人之间居然有那么密切的合作,而且很快就搞出了支配美国乃至全球比较政治学二十多年的体系。这其中当然有帕森斯的结构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为前提和基础,但最根本的奥秘就是战后美国学者的强烈使命感——配合美国政府打赢冷战。

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阿尔蒙德首先阐述“政治结构的普遍性”和“政治功能的普遍性”,在此前提下确立了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党沟通

^① 杨光斌:《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参见杨光斌主编:《比较政治评论》2003年第1辑。

^② [美]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和政策与法律制定为主要功能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统一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指引下,对世界上不同地区政治的介绍均由五个部分构成:背景——变化的过程——政治集团和政治功能——政府结构与权威功能——政治整合。

这在今天看来实在不可思议,一个自称多元主义文化的美国居然搞出一个统一范式下的地区政治研究变量模型。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前面简单提及的意识形态,还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勃兴的行为主义的志趣,即建构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这只是开始。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范式因为具有一般性,就拓展为全球政治研究模型,这就是比较政治学的第二版。

第二版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是将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范式更加抽象化和一般化,用来分析所有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过程与政策过程,并将政治文化纳入结构功能主义之中,其功能变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作为政治体系功能的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作为政治过程功能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以及作为政策制定功能的政策产品和政策反馈。第二版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认识比较政治学有着窗口性和决定性影响。

第三版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是对广泛批评回应的产物,即阿尔蒙德等人主编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2006年英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文版)。不同于第二版的是,第三版除了坚持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外,还将结构功能主义的一些功能变量用于分析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当然分析这些国家的结构已经不再像第一版那样死板,不再存在“变量模型”。我对第三版的印象是,与其说是教科书,不如说是比较政治学手册了,因为没有一所大学能在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讲授完这本无所不包的比较政治教科书。

第一版和第二版是20世纪50—70年代无可替代的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学应该被称为“阿尔蒙德时期”,也是典型的“西方发展主义”时期。所谓西方发展主义,即按照西方的道路,发展到西方的模式,带来阿尔蒙德所说的七种政治功能。在发展主义的鼓励下,20世纪60年代有几百位美国大学生走向非西方国家,开始寻求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和阿尔蒙德所说的七种功能,结果没有看到他们想看到的,而是看到了美国模式所导致的政治灾难,以及各种传统与现代的杂乱无章的混合。于是他们又开始批判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西方发展理论,并提出种种替代范式。对阿尔蒙德的发展主义的有力批判可以概括为:

(1) 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所依据的美国和欧洲样板往往不适用于第三世界;

(2) 把所有国家捆绑在一起,而不顾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差异;

(3) 主张所有的好事情(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发展)一起发生,事实上经济和社会的政治现代化往往打破政治稳定;

(4) 过分强调分析的整洁性,无视阶级冲突和过渡阶段发生革命与内战的可能性;

(5) 无视跨国的宗教组织、全球市场的力量、多国合作、外国使节和国际信贷机构等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

(6) 歪曲了传统制度的作用,它们并没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让位或者消失,而是更具有适应性;

(7) 无视早发国家与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后者在发展的条件、速度、顺序和阶段等各方面各不相同,有很大的伸缩性;

(8) 其推理逻辑和方法论,特别是那些模式变量和它的功能方法都有结构性缺陷;

(9) 常常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实际伤害,比如在越南,在新制度建立之前就摧毁了它们传统的秩序结构;

(10) 与以创建稳健的、友好的、中产阶级社会为目标的美国对外政策牢牢捆在一起,这妨碍它成为一种有用的严肃的比较政治学方法;

(11) 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导致战争和越南政治的美国化,以此宣示了发展主义研究方式的破产。^①

这些都是极为有力的批评,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发展主义理论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统合主义、比较政治经济学、官僚威权主义等范式。第三波民主化让发展主义得以新生,所以才有第三版本。但是,正如亨廷顿所言,全球化时代的民主化在赋予普遍性的同时,也强化了文化本土性,因为语言霸权和技术的方便,反而使很多国家更强化保护本民族的政治意识。因而,在普遍性价值扩张之时,文明的冲突也更加严重,这种世界政治现象本身也昭示了世界政治多元主义的现实,以及“非西方发展理论”的重要性。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

^① 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董正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8 页。

言,作为一套政策分析工具,发展主义的典范即结构功能主义和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理论,还是有其应有的价值。

2. 非西方发展理论系列。在批判西方发展主义的过程中,一系列新方法取而代之,并运用于非西方国家研究。这个过程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大规模的成就则是20年后的事。在教科书编写上,非西方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算是威亚尔达了。和阿尔蒙德的系列教科书一样,威亚尔达也主编了非西方发展理论的系列教材,其中有专门的方法论,也有非西方发展理论指导下的非西方国家研究,它们分别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和《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

威亚尔达主编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①,如其书名,意味着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多元化的方向。威亚尔达首先回顾并批判了比较政治学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比如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众多方法论的兴起和运用,并因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理论孤岛”,比如统合主义、依附理论、国家与社会研究途径、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公共政策、非西方发展理论、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新制度主义。威亚尔达认为“理论孤岛”现象本身是好事,即研究路径需要多元化,但呼吁“在群岛间铺设道路”,讲究理论的通融与融合性运用,比如统合主义、国家—社会关系与新制度主义之间的融合。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研究途径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同的研究议程自然需要相应的研究方法。同时,单一方法或途径的有限性意味着,理论流派之间必须具有通融性,从而达到人们近来提倡的方法论“折中主义”。

威亚尔达主编的《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专门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本土模式:东亚、印度、拉丁美洲、非洲、中东伊斯兰地区、东欧、俄罗斯与中亚。无疑,文化主义对于研究这些地区的政治发展很重要,或者说地区研究的文化主义路径才使得地区研究上升为“本土模式”,比如东亚政治中的儒家传统、印度的政党化种姓制度、拉丁美洲的统合主义传统、中东的伊斯兰主义,等等。但是,“本土模式”也是发生在全球化时代,因而这些具有本土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中也难免受西方政治的影响,比如法治、人权、民主、平等,无不影响非西方国家的政治过程。所以,如其书名,这本教科书客观地描

^① 威亚尔达等著:《比较政治研究的新方向》,李培元等译,台北:韦伯文化公司2007年版。

述了“地区模式和全球趋势”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也矛盾重重。如前,在全球化民主化的双重冲击下,非西方国家的本土文化和本土政治模式意识反而有可能更加强烈,比如中国提出了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可以视为文化自觉和本土模式意识。

威亚尔达著的教科书《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算是其多元主义方法论的体现了。本书大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史的,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比较政治研究(第2章)到美国发展主义时期(阿尔蒙德时期,第3章),以及诸多方法论如统合主义、政治经济学、理性选择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新制度主义等对发展主义的挑战(第5章),同时少不了专门的政治文化介绍(第4章)——因为任何多元主义方法都会强调文化的重要性,只有文化才更显出发展方式上的区别,在本书的最后讲到比较政治研究方法上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第10章);第二部分则是当下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主题即从威权主义向民主转型问题(第6章);第三部分则是发展中国家(第7章)和发达国家(第8章)的一般性概念和发展过程的介绍,并简单地指出比较政治学的前沿问题如女权主义、毒品、移民、环境污染(第9章)。

我认为,威亚尔达旗帜鲜明地提出方法论多元主义显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上的新进展,因为没有任何单一的研究范式能够解释所有的重大问题,或者说任何重大问题都不是单一的方法论能够解释得了的,因此如果能够做到在多元方法论中坚持“折中主义”即综合运用诸种方法来解释某一问题,是最理想的。这是值得鼓励的一种方向。

但是,鼓吹多元方法论的威亚尔达也不可能置身于环境之外,面对第三波民主化中的威权国家的转型,他在其独著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吗?》一书中,似乎又在肯定其曾强烈质疑和批判过的发展主义,在发展主义范式下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民主化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主张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如威亚尔达这样的学者,到最后也脱离不了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议程即民主化。我们知道,民主化还是现代化下的一个概念,两者同属发展主义范畴。这样,曾强烈质疑发展主义的威亚尔达最终又回到发展主义,只不过随着非西方国家研究的丰富,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并没有像其前辈那样乐观。他是批判性地看待民主化转型:第一,其他国家的民主是用来分析的而非可以促进的,否则就忽视了民主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极度困难的过

程；第二，民主化转型是单向度的目的论，但没有看到这一进程中会有停止、中断，甚至逆转；第三，民主化转型是一种普世性价值，认为民主就和经济发展一样同样重要，忽视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对民主认识和路径差异；第四，很多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是诸种政体的不规则的混合、重叠和交叉，其中民主的、威权主义的或统合主义的都有。^①

3. 方法论运用型。所谓方法论运用型，就是总结相关方法论在特定议程上的研究成就，以便为后来者提供研究路径和视角。属于这一类的教科书有三本代表性著作，第一本是《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②，有美国比较政治文献精选读本甚至把它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现代经典。^③ 这本教科书的基本结构是：先对“三大主义”（即理性选择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主义）方法论做系统的梳理，然后专门介绍每一个方法论所适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回顾该方法论在特定研究对象上所取得的研究成就，相当于文献综述但不止于此，指出各种路径的局限以及需要突破的方向。比如，在“国家”研究方面，概述整理了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系统论主导的结构主义以及新近的历史制度主义的各自贡献，并认为贡献最大的还是结构主义，因为历史社会学大家诸如迈克尔·曼、摩尔、斯考切波和沃勒斯坦等，都是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取向。

虽然是“三大主义”教科书，但各部分的作者并没有将各种方法论之间做简单的对立和区隔，比如理性选择主义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之间的混合是理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重要方法论（第7章），社会运动研究也离不开结构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之间的混合（第6章）。

该书对大量经典文献做了方法论脉络上的综述，没有先修课程基础和大量的阅读是很难理解这本书的，因此该教科书适用对象为研究生。

我认为，该书的最大贡献就是对既有经典文献的方法论回溯。很多经典文献的形成并非一定具有某种明确的方法论，但是通过方法论脉络下的综述，强化方法论自觉意识，会使学生带着方法论意识去阅读经典文献，临摹经典作品，这样会大大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比如，哈佛大学的巴林顿·摩尔学派^④，摩尔

^① 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发展中国家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② [美]利希巴赫和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储建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 Patrick H. O'Neil and Ronald Rogowski, *Essential Reading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ird edition,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 p. 1.

^④ 一般认为，摩尔历史社会学学派包括亨廷顿、查尔斯·梯利、斯考切波等杰出学者。

的弟子斯考切波和斯考切波的弟子埃特曼就是在明确的方法论自觉意识基础上写下了经典之作。^① 摩尔自己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十分娴熟,但是在其中很难发现具体的方法论陈述。这是具有高水平的学术大家才能达到的境界。但斯考切波和埃特曼在其年轻时仅仅凭借博士毕业生的身份就留下经典之作,一定有其捷径所在,其秘诀就在于有明确的方法论关怀,比如斯考切波的回归国家学派即强调国家自主性,从而在摩尔研究的基础上把问题向前推进一步;而埃特曼的成果则得益于历史制度主义,比如路径依赖、时间性、关键时刻等关键概念。这也意味着,即使学养远不如摩尔那么高深,掌握了方法论的初学者,也可能“走捷径”,也可能留下经典之作。历史社会学研究是这样,理性选择主义路径更是如此,比如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都是博士论文。

第二本是《比较政治学:理论、案例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严格说来,从阿尔蒙德的西方发展主义到威亚尔达的非西方发展理论,都是方法论性质,这是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是其方法论背后是世界观,就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方法论”,因此也可以说是世界观型教科书。比较而言,这里所归类的“方法论运用型”教科书,虽然也蕴含着一定的世界观,但看上去似乎更着眼于研究问题本身而非刻意的世界观传播。扎哈里亚迪斯的教科书是文集性质的,即对各种方法论之下的代表论文进行汇编而供学生阅读,基本上是一篇方法论论文对照一篇研究论文,比如政治文化问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英格尔哈特的政治文化的复兴,接着就是一篇南部非洲的民族主义与族群认同的论文。这种体例的好处是让学生“边学边干”,比纯粹的方法论教科书有了更落地的感觉,也可以起到让学生临摹范文的作用。这种体例的问题在于,就是在政治文化方法论之下,研究成果如此丰富,一对一的介绍不足以让学生了解其他文化之下的政治发展状况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另外,一篇方法论下一篇研究主题的安排有时会显得牵强,比如把“制度否决点”的论文归类为理性选择方法论似乎就值得讨论,否决点的出现很多时候是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所致,而不是个人或者集体偏好选择问题。

第三本是托德·兰德曼的《最新比较政治的议程与途径》^②,从标题就可以

^① 斯考切波的博士论文是著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埃特曼的博士论文是《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② [英]托德·兰德曼:《最新比较政治的议程与途径》,周志杰译,台北:韦伯文化公司2007年版。

知道这本书的主题,即方法与议程。本书的议程很简单,就是社会运动、民主和人权,其实议题就一个:民主。这也基本反映了西方政治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向,即从现代化研究转向民主研究。有趣的是,这本书主要集中于比较研究方法,全面地介绍了在社会运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比较研究方法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关于民主研究,系统介绍了众多国家间的民主比较、若干国家间的民主比较以及单一国家间的民主研究。这种议程介绍则体现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在比较方法部分,作者系统介绍了如何进行国家比较,以及国家的选取与比较方法问题,其中讲到三种类型的国家比较研究:众多国家比较、若干国家比较以及单一国家比较。要学习比较研究方法,此书值得一读,或者说这本书是比较政治学的比较方法教学部分的有用教材。

4. **国别政治型**。国内翻译出版的国别政治型的比较政治教科书仅有迈耶等三人著的《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在内容上,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标签去区分国家类型,比如所谓的“工业民主国家”“工业独裁和专政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但是沿着历史—文化脉络和政策过程对三类型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介绍,对本科生认知世界政治大有裨益。没有对各国政治的基本认知,方法论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因为方法论背后是世界观与认识论。比如,社会选择理论在美国很流行,基本假设是不存在稳定多数的共同福利,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本体论的方法论,是意识形态。必须认识到,比较政治研究是最具政治性也就是意识形态色彩的学科,但是一旦从历史—文化视野和政策过程角度去看问题,意识形态色彩就会被大大淡化。比如,关于法国政府与政治,这本书讲到革命的遗产所塑造的“不稳定”是法国政治特有的特征;而法国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所造就的强大的官僚体系,带来的是“僵持社会”中举步维艰的决策过程。这样,就在客观上破除了有了“民主”就一好百好的迷信。

这本教材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不同于先入为主的方法论教材,首先提供了学生看待比较政治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就是国家——有效政府——危机——文化——政策过程。具体而言,比较政治其实就是比较国家研究,而国家依赖于有效的政府(并不必然是西方所推崇的民主政府);建立国家和有效政府是困难的,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即危机和文化上的影响与约束,而这些危机和文化同时又约束着政策过程。

可以说,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理解各国政治,比单纯的方法论教材收获

更大。

5. 问题导向型。奥尼尔和罗戈斯基编的《比较政治学文献精粹》^①是一本典型的以关键词或问题为导向的教科书,依次为国家、国家与社会、政治经济、民主政体、非民主政体、发达的民主、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欠发展与新兴工业国家、政治暴力、全球化,其中每一个主题下的文献可谓经典之作,比如讲到国家问题就需要读马克斯·韦伯的《作为天职的政治》,讲到国家与社会关系则必须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政治经济问题必须读斯密的《国富论》和诺斯的“制度论”相关著作,等等。

相对于国别政治型和方法论型,问题导向型教科书用于教学的难度更高更大。这些问题都是从比较政治发展中抽象出来的,每个问题的下面或者背后都有无穷尽的基于若干国别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是一门课程,而如果只集中于一个国家而谈所谓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关系,其一般性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因此,问题导向型教科书作为比较政治学课程的若干参考书中的一种倒是有一定的助益,但作为主要教材则容易让学生“盲人摸象”甚至误导学生。或者说,这样的教科书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比较政治学关键词,适宜于用来研究而非教学。

6. 简单的评论。英语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有了中文版本,这里列举了十本左右。主题、风格和方法论如此多样的教材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其实就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达。在列举过程中已经分别给予简单的评论,进一步对它们进行总体评价很不容易,必然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甚至会“冤枉好人”。尽管如此,总体评论性的工作依然是必要的。那么,发达的美国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到底有什么一般特征呢?

第一,美国比较政治学的总体特征就是强烈的“国家使命感”。比较政治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则是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科兴起的直接背景,而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下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历史更是人所共知。为此,推广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就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不二选择,这一点尤其是在20世纪50—70年代的“阿尔蒙德时期”尤为明显。在貌似多元主义化的今天,从研究主题到方法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美国性格”。

第二,研究主题上的“国家使命”。六十多年来,美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题

^① Patrick H. O'Neil and Ronald Rogowski, *Essential Reading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ird edition,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0.